

近代戰爭下的日本與台灣 地緣經濟學的觀點*

李世暉

國立政治大學日本研究學位學程教授

摘要

日本是引發或參與近代東亞地區戰爭的重要角色，而台灣則是此一歷史發展過程中的關鍵。殖民統治時期的台灣，在經濟上是日本的農業資源提供地，在軍事國防上則是日本的南進基地。對日本而言，無論是二次世界大戰之前，還是戰後的冷戰、後冷戰時期，台灣在東亞地緣經濟的變遷過程中，一直扮演重要且關鍵的角色。

關鍵詞：近代戰爭、地緣經濟、日本、台灣、經濟安全保障

* 發表於「第六屆台灣近代戰爭史學術研討會：從戰爭歷史看台灣的地位與前途」，高雄：高雄市文化中心至善廳。論文的部分內容摘錄於李世暉（2016）。

壹、前言

在日本帝國的發展歷史上，1905 年是一個重要的轉捩點。日本以本年度為起點，從資本主義邁入帝國主義進程。本年度最重要的一件大事，就是日俄戰爭。日本藉由日俄戰爭的勝利，成功地遏止俄羅斯帝國的南進，不但確保日本在朝鮮半島的權益，更從帝俄手中獲得南滿的利權。另一方面，日本在日俄戰爭中的勝利，讓歐美列強對日本刮目相看，也使得日本國威在國際上達到前所未有之地位。然而，戰爭的勝利也讓日本開始走向以武力為後盾，向外積極擴張的帝國主義路線。

另一方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發展具有重大影響的另一件大事，也是發生在 1905 年，即殖民地台灣的財政從本年度開始不再依賴日本國內的補助金，開始由「赤字經營」轉為「黑字經營」。隨著台灣經營的成功，日本一方面得以厚實帝國主義發展的基礎，另一方面也得以將台灣成功的經驗，漸次地向朝鮮半島、滿州以及大東亞共榮圈擴張。

眾所周知，身為海洋國家的日本，缺乏工業製造的關鍵資源，必須倚靠通商與貿易來維繫國家與社會的正常發展。因此，如何構築一個穩定的國際經濟環境，乃是攸關日本國家與社會發展的重大議題。明治時期的日本，在面對此一重大議題的時候，其思考脈絡主要來自於 1889 年出版的《斯丁氏意見書》。1888 年，一手創建現代日本軍事制度的山縣有朋，前往德國拜訪法學專家斯丁（Lorenz von Stein），詢問其對日本軍事的意見。斯丁認為，國防概念可分為以防衛國家主權為主的「權勢疆域」，以及能影響主權獨立性的「利益疆域」（轉引自加藤陽子，2002：82-97）。

當時的日本，推動的是重視「權勢疆域」（Machtsphäre）的「守勢戰略」。然而，隨著國力的增強，日本開始採取重視「利益疆域」（Interessensphäre）的「攻勢戰略」。前者的出發點是地緣政治的思考，強調防衛國土安全（特別是首都東京）與國內市場秩序的重要性；後者則是地緣經濟的思考，主張必須建立區域市場與資源的勢力範圍。然而，無論是「守勢戰略」還是「攻勢戰略」，軍事力量的行使是當時日本的首要考量。而日本對於軍事力量的執著，接連在東亞地區引發「甲午戰爭」（1894 年）、「日俄戰爭」

(1904年)與「太平洋戰爭」(1939年)。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對於地緣概念的理解，以及關於戰爭與戰略的思考，直接反映在當時「日本帝國的對台政策」上。

然而，無論是日本國內還是海外的研究，關於此一時期的日本帝國主義發展的相關論述，焦點都是放在日俄戰爭，而忽略了台灣的角色。事實上，在國際列強由資本主義向帝國主義發展的階段，日本資本主義是最晚、最後帝國主義化的國家。而台灣則是日本帝國主義階段中，最先成為日本殖民地的地區。因此，對「最後帝國」的日本而言，其在東亞地區的戰略擴張與戰爭的遂行，「最初殖民地」台灣的角色，是極為重要的。從經濟的觀點來看，因為有了台灣經營的成功，日本帝國主義才有餘力支援朝鮮半島的經營。而之後的滿州經營與南進擴張，更可以說是地緣經濟思考下的台灣經驗延長。有鑑於此，本論文將從地緣經濟的觀點出發，分析近代日本在東亞地區的戰爭擴張過程，以及台灣所扮演的角色。

貳、從地緣政治到地緣經濟

一、地緣政治的發展

「地緣政治」(geopolitics)的概念源自於19世紀末期。當時，全世界的大部分地區都籠罩在歐美帝國主義的支配下，世界體系逐漸成形。歐美列強以及所有其他的國家，必須開始在有限的「唯一」空間內一較長短。由此，以政治景觀與環境關係為研究主題的現代政治地理應運而生，而以空間觀來解析國家和國際關係的地緣政治亦水到渠成(楊宗惠，1999：159-60)。1916年，瑞典學者克哲倫(Rudolf Kjellen)首創「地緣政治」一詞，並將地緣政治定義為：將國家是為地理有機體或一空間現象，著重探討地理與應用政治學之間相互關係的科學(藤沢親雄，1925：49-51)。

地緣政治躍上西方學術舞台之後，朝向下述兩個方向發展：第一，分析世界權力的分配與制衡，代表學者為美國海軍將領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與英國學者麥金德(Halford J. Mackinder)；強調國家應如何維繫

國際霸權以及阻止新霸權的誕生。¹ 第二，分析國家生存與地理環境之間的關係，代表學者為德國學者豪斯霍夫 (Karl E. Haushofer)。其概念分析的重點在於：國家必須善用地理環境因素，以利其在世界政經體制中建構「生存圈」(Lebensraum)。²

1925 年，日本國際法學者藤沢親雄在《國際法外交雜誌》中，以國家論的角度介紹克哲倫的地緣政治理論後，開啟了近代日本地緣政治的論述發展。至 1945 年太平洋戰爭結束為止，日本地緣政治的發展大致可分為前期 1920 年代、中期的 1930 年代、及後期的 1940 年代。前期的主要活動為西方地緣政治理論的介紹，代表學者為前述的藤沢親雄、及地理學者飯本信之。中期的主要活動是以亞洲主義分析日本的地緣政治環境，代表學者為京都大學地理學者小牧實繁。後期的日本地緣政治，則是受到豪斯霍夫的「生存圈」概念影響，在海軍中將上田良武擔任會長的「日本地政學協會」主導下，發展出「新東亞秩序」與「大東亞共榮圈」的理論基礎(參見表 1)。

1925 年，日本國際法學者藤沢親雄在《國際法外交雜誌》中，以國家論的角度介紹克哲倫的地緣政治理論後，開啟了近代日本地緣政治的論述發展。至 1945 年太平洋戰爭結束為止，日本地緣政治的發展大致可分為前期 1920 年代、中期的 1930 年代、及後期的 1940 年代。前期的主要活動為西方地緣政治理論的介紹，代表學者為前述的藤沢親雄、及地理學者飯本信之。中期的主要活動是以亞洲主義分析日本的地緣政治環境，代表學者為京都大學地理學者小牧實繁。後期的日本地緣政治則是受到豪斯霍夫的「生存圈」概念影響，在海軍中將上田良武擔任會長的「日本地政學協會」主導下，發展出「新東亞秩序」與「大東亞共榮圈」的理論基礎(參見表 1)。

¹ 馬漢在《海權對歷史的影響》(*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一書中指出，海洋是歷史最重要的動力，也是國家財富與實力的最終決定因素。而擁有強大的海軍，則是國家尋求權力的關鍵 (Mahan, 1918 [1890])。麥金德則是提出「陸/海對峙」的觀念，主張在蒸氣火車與鐵路運輸網絡的快速發展下，未來將是陸權國家主導的時代 (Mackinder, 1919)。

² 豪斯霍夫提出的「生存圈」概念，是由各國人口成長率來決定的空間需求。任何國家都有權追求國家的有機成長，達成「自己自足」(autarky) (Haushofer, 1940)。

表 1：戰前與戰時日本地緣政治學的發展

	時間	學術活動／學術觀點	代表人物／組織
前期	1920 年代	介紹西方地緣政治理論	藤沢親雄、飯本信之
中期	1930 年代	以亞洲主義分析日本的地緣政治環境	小牧実繁
後期	1940 年代	發展出「新東亞秩序」與「大東亞共榮圈」的理論基礎	「日本地政學協會」

值得注意的是，戰前的日本地緣政治，主要還是圍繞在歐陸學者（特別是豪斯霍夫）的理論圍繞下進行論述，強調的是國家主義的「領土空間」。即便如此，也有部分日本學者開始認知到，領土空間概念有其分析上的僵固性，必須輔以相對動態的經濟學概念。例如，江沢讓爾（1939: 212-15）即主張，單純以物理的領土空間理解地緣政治，將會遭遇理論上的侷限；必須透過經濟的觀點，透過對經濟空間的分析，補足地緣政治的理論缺陷。

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由於地緣政治被視為德日兩國發動戰爭的理論基礎，使得德國與日本的地緣政治研究，沉寂了一段不算短的時間。以德國為例，一直要到 1970 年代，地緣政治才回到德國的主流學術領域，但其關注的不再是國際政治議題，而是國內的社會地理議題。另一方面，在美國主導的冷戰體制下，地緣政治的研究重鎮也由過去的歐陸地區，轉到世界強權的美國（楊宗惠，1999：165）。

戰後初期美國的地緣政治思維，主要是在防止歐亞大陸出現一個強大的陸權國家。由肯楠（George F. Kennan）的「圍堵政策」（containment），就是最具代表性的思維。到了 1970 年代，「布列敦森林體制」的崩解、德日經濟勢力的崛起等國際政治經濟局勢因素，為美國的地緣政治研究帶來新的課題。以 Saul B. Cohen 為首的戰後美國地緣政治學者主張，在當代國際社會，國與國的競爭是在分隔世界中的區域舞台上進行，任何國家均可透過資源的成長換取權力位階。因此，地緣政治沒有絕對的優勢地區，區域主義將成為世界權力均衡的關鍵（Cohen, 1973）。換言之，在國際政治系統出現權力分化之際，以動態思維思考不變的地理特徵，是戰後地緣政治研究內容與研究途徑的一大轉變。

二、地緣經濟的崛起

整體而言，20 世紀初開始發展的地緣政治，在內容上強調陸權、海權的國家競爭，曾經是主要國家制定戰略的理論基礎；而在政策與侵略擴張主義的緊密結合，也使其一度淪為學術批判的對象。在冷戰時期，自然資源、出海港口、國家位置等現實地理環境因素，依舊是主導地緣政治的重要思維，但部分地緣政治的基本假設，已經開始劇烈變化。

首先，航空技術的發展打破了原本陸權鐵道與海權船艦對立的態勢，傳統地緣政治理論已無法說明空軍與長程飛彈的戰略意涵。其次，在經濟全球化的趨勢下，經濟層面的相互依賴關係，已取代以軍事競爭為主的對立關係，成為國家互動的常態。其三，領土空間不再具有絕對的正面價值，其負面意涵開始受到重視。最後，國力衡量基準從國家基本要素（國土面積、人口與天然資源）上的軍事力量，轉變為重視國家的經濟結構、科技發展與財政能力。

有鑑於傳統地緣政治學的適用性受到質疑，部分學者乃提出「地緣經濟」（geo-economics）的概念，取代以國家為行為主體，以軍事力量為權力基礎的傳統地緣政治。例如，Edward N. Luttwak（1990; 1993）即認為，冷戰的結束使世界進入了地緣經濟時代。在地緣經濟時代，決定一國國際地位的不再是武力，而是以經濟實力與科技力量為基礎的綜合國力。因此，國家之間的競爭環境，已經從過去的政治舞台，轉移到了經濟舞台；而國家間的競爭模式，也從過去的軍事主導的戰爭型態，變為通過國家政策來占領世界經濟版圖。此外，由於全球化的快速進展，過去按地緣政治概念所劃分的假想敵與競爭對手，在地緣經濟時代可能同時是緊密的貿易夥伴。換言之，地緣經濟所標誌的是一個超越國界與區域的新時代，以及競爭與合作並存的新關係。

此一地緣經濟學的概念，就是研究如何從地緣角度出發，在特定區域範疇內以經濟手段來謀求國家利益的學科或理論。地緣經濟學所強調的經濟手段，主要包括共同開發能源、天然氣輸送管線過境許可、設立邊境自由貿易區及加入區域經貿組織等。國家可經由這些經濟手段，與鄰國或區

域國家形成更緊密的互賴關係（吳雪鳳、曾怡仁，2014：67-68）。若以戰略目標的觀點，地緣經濟是從地理的角度出發保護本國在國際競爭中的國家利益。因此，地緣經濟學戰略在目的上，更多地體現在國家的經濟利益（或是經濟層面上的國家利益）。

值得注意的是，地緣政治從政治地理的觀點出發，主張透過確保國家的政治利益來維護國家的經濟利益；而地緣經濟則是從經濟地理的觀點出發，強調達成國家利益的主要途徑是從經濟合作擴散至政治及安全領域的合作。換言之，地緣經濟學的出現，其目的是為了補充傳統地緣政治學的僵固之處，而不是為了追求新的研究典範。

參、戰爭、日本帝國與台灣

一、日本帝國的「主權線」與「利益線」

1850年代，初次登上國際政治舞台的日本，立即發現其身陷西方列強為非西方國家所設計的不平等條約網絡之中。此一網絡機制包括條約港、固定關稅、最惠國待遇、治外法權等制度，且已被應用於暹羅（1855）、波斯（1857）、中國（1858）、土耳其（1861）等國。因此，日本國內的有識之士與民族主義者抨擊這套機制，並將其視為對國家主權的侵犯。不平等條約網絡的修正與廢除，是當時日本內政中最迫切、最具爆炸性的議題（Jansen, 1984: 62-65）。中國在「鴉片戰爭」的失敗經驗讓日本了解到，與西方直接對抗是無效且危險的，唯一的選擇是學習西方的技術，並建立現代的國家體制加以因應。

歷經幕末時期的短期動盪，新成立的明治政府，一方面透過大政奉還、廢藩置縣、土地改革、徵兵制等「明治維新」的政策措施，走向中央集權的帝國發展路線；另一方面則是積極確立新帝國的領土疆域，包括與俄羅斯交涉北方的庫頁島、千島群島的歸屬，與滿清交涉南方琉球群島的歸屬，以及與英美交涉東南方小笠原群島的歸屬。經過數年的交涉，日本放棄庫頁島換取對千島群島的支配權，並將小笠原群島與琉球劃歸明治國家的領

土。確立國家疆域後的明治政府認知到，日本是一個島國，在海岸線的防衛上更顯困難。相較於 13 世紀的蒙古來襲，18 世紀開始的工業革命，讓西方國家的科學技術得以快速進展，消弭了原本日本倚靠的「距離障壁」。此一「黑船來襲」的經驗，讓明治政府徹底了解到，海洋與距離不再是日本安全保障的優勢；如何拒敵於「境外」，即成為當時考量日本安全保障課題的重點。

對明治政府來說，面對來自亞洲大陸的威脅，朝鮮半島是日本必須掌控的「境外」決戰之地。明治初期由西鄉隆盛、板垣退助、江藤新平、後藤象二郎、副島種臣等人主張的「征韓論」，其導火線雖然是朝鮮拒收明治政府的國書，但在明治政府內部的討論過程中，「經略」概念逐漸凌駕於原始的「睦鄰」思維之上（吉野誠，2000：11）。換言之，以宣揚維新理念與天皇威令為目的的「征韓論」，其原始的出發點，依舊是十三世紀以來日本在安全保障上念茲在茲的「支配」朝鮮半島。而面對來自海洋另一邊的西方威脅，海洋則是日本必須掌控的「境外」決戰之地，琉球與台灣在此扮演關鍵的角色。1872 年，明治政府將琉球王國置於鹿兒島縣的管轄，通告其奉行明治年號，並要求琉球與滿清斷絕往來，迫其改制為「琉球藩」。1874 年，明治政府以琉球難民遭台灣原住民殺害為由，發動「征台之役」（台灣稱之為「牡丹社事件」）。

就地緣政治（geopolitics）的觀點而言，當日本帝國在將國家的安全保障建構在朝鮮半島的支配時，地緣條件就成為無法克服的戰略限制。進一步地說，當日本的安全保障取決於朝鮮半島的掌握，而朝鮮半島的安全取決於中國東北（滿洲）的安定時，此處就成為日本、中國與俄羅斯的核心戰略關鍵地。這是因為，東北滿州是中國華北地區的屏衛，也是俄羅斯遠東地區的生存命脈。如此一來，中日俄在地緣戰略上的結構性衝突，就成為無法避免的事實（何耀光，2013：233）。1894 年的甲午戰爭與 1904 年的日俄戰爭，既是日本帝國對外擴張的侵略政策，也是日本帝國尋求自國安全保障的傳統思維。

當時的外務大臣陸奧宗光，曾在其執筆的外交記錄著作《蹇蹇錄》中提及，朝鮮國經常陷入朋黨鬥爭與內鬨暴動，欠缺一個獨立國家應有之責

任。有鑑於朝鮮半島對日本帝國的利害關係，針對朝鮮國的動盪，日本不僅應該伸出援手，以建立兩國邦誼；更應該主導讓其脫離中國，並恢復「安寧靜謐」，以全日本「自衛之道」（陸奧宗光，1929 [1983]）。陸奧宗光的觀點，可以反映出明治政府朝向帝國發展時的安全保障思維：即固守本國「主權線」的同時，也強調「利益線」的防護。而此一利益線上的焦點，則是朝鮮半島。按照當時陸軍軍人出身的內閣總理大臣山縣有朋的說法，俄羅斯的西伯利亞鐵路完工後，即是朝鮮半島多事之秋的开始；朝鮮半島的多事，會直接影響東洋（日本）的變動（渡辺利夫，2007：7）。換言之，對當時明治政府而言，維持朝鮮國的獨立，進而支配朝鮮半島，實乃保障日本利益線的至急之務。

另一方面，明治政府也同時受到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的海權論影響，重視海洋軍力的建置與南洋地區的經略。馬漢於1890年出版的《海權對歷史的影響》（*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一書，透過日本海軍省外圍團體「水交社」的翻譯，在明治政府內部形成一股「建軍制海」的風潮。馬漢分析1660年至1783年的美國海軍歷史後，歸納出國家最關鍵的力量在於「制海權」。這是因為，海洋同時具有高度的經濟價值與軍事價值。在經濟價值方面，海洋的運輸體系能為國家帶來大量商業利益；而在軍事價值方面，海洋可保護國家免於在本土交戰（Mahan, 1918 [1890]）。

二、日本帝國安全保障的台灣角色

受到利益線與海權論的影響，在甲午戰爭中獲勝的日本帝國，向戰敗的清朝索取了遼東半島與台灣。前者是穩定與支配朝鮮半島的重要布局，後者則是制海揚威的戰略方針。1895年4月，日本與清朝簽訂『馬關條約』，台灣的割讓已成定局，日軍也開始向台灣進軍。日本的軍隊，從1895年5月自台灣北部登陸後，到同年11月大本營宣佈台灣全島平定為止，日軍總共投入陸軍2個半師團約5萬人，軍屬和軍伙2萬6,000人，軍馬9,500匹，佔當時陸軍1/3以上的兵力。海軍則動員了大半的聯合艦隊（小熊英二，1998：71）。台灣島內的激烈抵抗，出乎日本政府的意料之外。

另一方面，甲午戰爭的勝利，使日本國內瀰漫一股「大日本主義」的風潮。對抱持「大日本主義」的日本領導菁英階層而言，台灣的獲取決非大日本帝國主義的終點，而是日本國力向西方（中國華南地區）與南方（南洋地區）延伸的墊腳石。最早將這種思想露骨地表達出來的，是第二任台灣總督桂太郎的「意見書」。根據桂太郎的意見，台灣的設施經營，「不應只限於台灣的境域，而應以制定更遠大的、對外的進取政策」。此一對外進取政策，應先「與廈門保持密切的交通聯繫，確保我國在福建一帶的勢力」；接著「以台灣為立足之地，以廈門為港口門戶，將我國勢力向華南地區延伸」；「將來再以台灣為根據地，向南洋地區伸張我國政商勢力」（鶴見祐輔，1965：414-17）。簡單來說，以台灣為起點，經營中國華南地區，將日本帝國的勢力伸向南洋地區，是當時日本帝國指導者胸中所擘劃的國策藍圖之一。

此一國策大綱出現的背景，是因為俄、德、法三國以「友善勸告」為藉口，迫使日本把遼東半島還給清朝。「三國干涉還遼」事件，粉碎了日本欲將朝鮮置於本國保護之下的構想。當時日本首相山縣有朋所規劃之「義和團事變善後策」（北清事變善後策）中，針對甲午戰爭後日本帝國的對外政策，主張「遼東的歸還與威海衛的放棄之後，考察東亞形勢與國力的盈虛，應採北守南進」（大山梓，1966：261）。此一南進政策的構想，之後為同樣是長州藩出身，也是山縣有朋直系桂太郎所承繼。最初將南進政策具體化的官方文書，是第四任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的「關於台灣統治的既往與將來備忘錄」（台灣統治ノ既往及将来ニ関スル覚書）。在備忘錄中，兒玉延伸桂太郎的南進政策，力陳台灣島內統治乃是華南地區經營的基礎（鶴見祐輔，1965：88-94）。兒玉源太郎與桂太郎兩人同為長州藩山縣派系，平日私交親篤，在政治上也是盟友關係。因此，在南進政策上，兩人持有相似的意見並非偶然。

事實上，不僅是桂太郎與兒玉源太郎，除了首任台灣總督樺山資紀（在任期間為 1895 年 5 月至 1896 年 6 月）為薩摩藩的海軍武官之外，從第二任的桂太郎到第七任的明石元二郎為止，台灣總督均為長州藩山縣有朋派系，或是其後繼者寺內正毅派系出身的武官。舉例來說，第二任台灣總督

桂太郎（1896年6月至10月），第三任總督乃木希典（1896年10月至1898年2月），第四任總督兒玉源太郎（1898年2月至1906年4月），第五任總督佐久間佐馬太（1906年4月至1915年5月），均為直屬山縣有朋派系的長州（現山口縣）武官。第六任的安東貞美（1915年5月至1918年6月）直屬寺內正毅派系，長野出身。第七任台灣總督為深得寺內正毅信賴的明石元二郎（1918年6月至1919年10月），福岡出身。

透過北守南進政策與台灣統治政策的連結，屬於山縣系以及寺內系的台灣總督之種種思慮作為，決定了甲午戰爭後日本帝國的發展方向，以及新殖民地台灣的角色地位（大江志乃夫，1993：8）。換言之，台灣的取得改變了日本帝國的安全保障政策方向。然而，台灣總督府主導的廈門佔領計畫，因西方國家的強烈抗議而失敗；再加上俄羅斯佔領滿州的舉動，讓二十世紀初期的「北守南進」政策大綱，急速向「北進論」傾斜，最終引發了「日俄戰爭」。³

無論是「北進」還是「南進」，當時日本帝國的安全保障政策，是掌控在前述長州藩陸軍的手中。長州藩陸軍在甲午戰爭之後，透過「總督／都督武官專任制」，獨占了日本的殖民地支配權。1913年，薩摩藩海軍的山本權兵衛出任日本首相後，開始對陸軍的殖民地支配權力提出挑戰。山本權兵衛企圖廢止「總督、都督武官專任制」與擴大內務省監督權限，從根本顛覆陸軍殖民地支配的基礎。同時，為對抗陸軍的北進論，海軍再度高唱南進論。1936年8月，在日本國內高唱南進論的背景下，南進政策經由日本內閣會議議決，首度正式成為日本「國策的基準」。明確記載：「鑒於帝國內外之情勢，帝國必須確立的根本國策，是透過外交國防，一方面確保帝國在東亞大陸的地位，另一方面則向南方海洋發展」（鹿島平和研究所，1973：11）。

1937年7月7日爆發「盧溝橋事變」後，中國與日本全面開戰，也同時讓海軍對南方的關心再度升高。1938年9月，在海軍的指示下，台灣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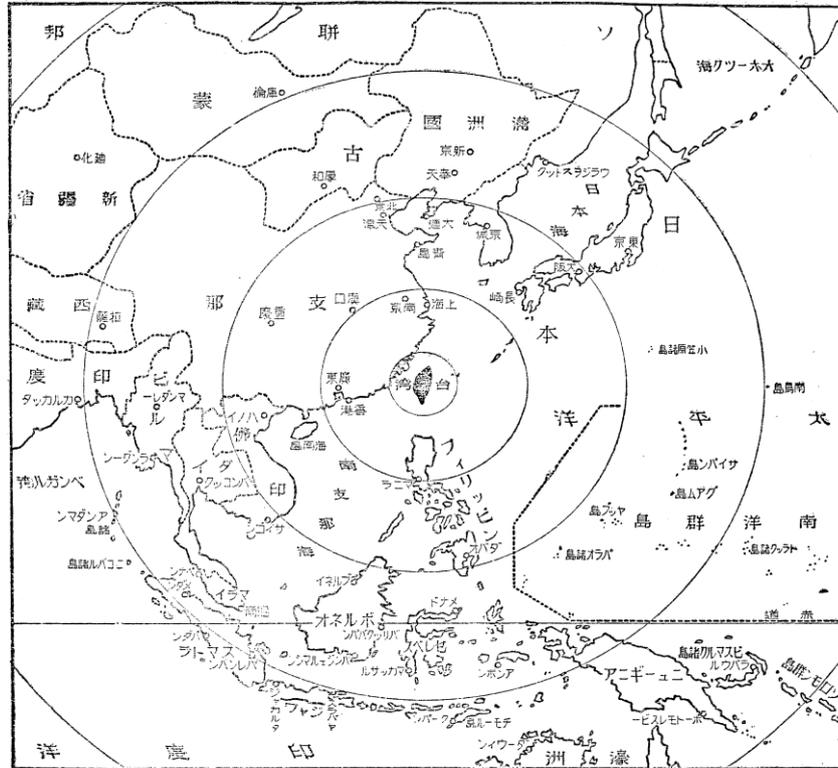
³ 1900年的「義和團事件」爆發後，台灣總督府以保護僑民為由，派遣陸軍進佔福建廈門。在英國、美國與德國的強烈抗議下，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乃下令退兵。此一軍事行動，一般稱之為「廈門事件」。

督府作成「南方外地統治組織擴充強化方策」，主張活用台灣經驗，以確立日本對廣東、汕頭、海南島的支配權。1939 年，日本佔領海南島之後，海軍決定由台灣總督府來協助該島的開發。日本因決心永久佔領海南島，故在島上大力推行土地改革、皇民化政策、專賣事業以及保甲制度。日本之所以將海南島的開發交付台灣總督府負責，其中一個重要的理由就是，台灣的統治經驗與統治技術有助於海南島的治理。這意味著，隨著中日戰爭的擴大，台灣在日本安全保障上的地位日形重要（李世暉，2006）。

上述對於日本帝國安全保障的論述，顯示了自明治維新、甲午戰爭、日俄戰爭以來，不可分割的歷史連續性。若以台灣為分析焦點，可以發現：取得台灣以進行殖民統治的經驗，不僅是日本帝國確保利益線的起點，也直接影響了後期的滿州、中國本土乃至大東亞共榮圈的國策方針。因此，就具體的安全保障方針而言，台灣既是日本帝國主義向大東亞擴張的起點，更是日本大東亞共榮圈的中心（見圖 1）。

三、殖民地台灣與日本經濟安全保障

西元 1816 年，英國頒布鑄幣條款，允許金幣的自由鑄造、自由兌換與自由輸出入，成為首度採用金本位制的國家。到 1876 年為止，歐陸的主要國家包括義大利、比利時、荷蘭及瑞士等國，先後成為金本位制國家，形成以歐陸先進國家為主的國際金本位體系。由於當時的英國在海外領有廣大的殖民地，掌控全球 50% 以上的黃金產量，對國際金本位制的運作擁有絕對的影響力。特別是當英鎊在國際上被廣泛使用之際，直接促成倫敦金融市場與其他國家金融市場密切連結。而透過上述連動與連結，英國乃被賦予指導國際金融政策的權力（Cohen, 1978: 81-82）。



資料來源：朝日新聞社（1944：2）。

圖 1：台灣為大東亞共榮圈的中心

而當時的歐洲金本位制國家，特別是英國，在政策上主觀地希望維持東亞地區各國的銀本位制。這是因為，歐洲各國相繼放棄銀本位，採用金本位時，將會導致國際銀價的下跌，增加各國施行金本位制的成本；而東亞地區銀本位制的存在，將有助於國際金銀匯率的安定。因此，英國早在 1871 年日本頒布『新貨條例』之際，就反對日本施行金本位制，希望日本採用銀本位制。然而，進入 1890 年代以後，歐洲各國在東亞地區的殖民地，其主要的貿易夥伴，逐漸由原本的銀本位國轉為以金本位國為主。對實施銀本位的這些地區來說，銀價的暴跌雖有助於出口的增加，但同時增加了匯兌的風險。而不安定的國際匯市也誘發東亞地區的投機交易，波及到該地區物價的穩定（小野一一郎，2000：163-64）。一旦歐洲金本位國了解到，維持東亞地區銀本位制已不符其經濟利益之際，阻礙日本金本位制成立的國際因素乃大為減輕，日本始得以順利推動金本位制的成立。

在此國際環境下，明治政府的松方正義內閣決定於 1897 年 10 月實施金本位制。然而，日本的產金量稀少，在國際貿易競爭下入超傾向日漸加速，又為了支付軍事費用而過度擴張信用（over-loan）。在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的情況下，日本欲依賴黃金做為通貨發行準備以建立金本位制，一開始就被認為是窒礙難行的。由於缺乏與貨幣發行量相應的黃金準備，日本乃將甲午戰爭的賠償金 3 億 6,000 萬圓，置於倫敦金融市場充當英鎊準備（小野一一郎，2000：211）。這種減輕黃金準備的替代方案，雖使日本藉由參與國際金本位制，得以獲取國際貿易上的便益；但是，日本也因此付出相應代價。由於日圓與英鎊的連動，使日本被迫承受英鎊外匯市場的波動，也使得日本對英國的金融依賴程度大幅上升。

結果，對資本不足的日本來說，若缺乏外資的支援，就無法順利經營殖民地；若不藉助國際金本位制的連結，就無法安全且有效地導入外資。日本金本位制的成立以及外債的發行，正式打開了甲午戰後海外資金得以流入日本的大門。舉例來說，1895 年至 1902 年的 7 年間，日本在台灣所使用的行政費用與軍事費用，高達 2 億 843 萬圓。日本為籌措此一龐大的經費，決意在倫敦金融市場發行日本國債。1895 年至 1913 年之間，日本在倫敦金融市場所發行外債的總額，計 7,890 萬英鎊，換算成日圓的話，其金額是甲午戰爭賠償金的 2 倍以上（鶴見祐輔，1965：190）。

另一方面，甲午戰爭的勝利，也使日本國內瀰漫一股「大日本主義」的風潮。對抱持「大日本主義」的日本領導菁英階層而言，由此開展之「甲午戰後經營」的重點在於，如何將日本的經濟勢力向外擴展。當時，俄、德、法三國以「友善勸告」為由，迫使日本把遼東半島還給中國，粉碎了日本欲將帝國勢力延伸至朝鮮半島的構想。因此，日本首相山縣有朋在其「北清事變善後策」中主張，在東亞形勢與國力盈虛的考量下，日本應採「北守南進」政策。而台灣的取得，也成為日本國力向西方（中國華南地區）與南方（南洋地區）延伸的墊腳石。換言之，以台灣為起點的經濟南向擴張政策，決定了甲午戰爭後日本帝國的發展方向，以及新殖民地台灣的角色地位（大江志乃夫，1993：8）。其中，台灣貨幣制度的變革過程，是理解此一時期日本經濟安全保障的重要事件。

明治政府自 1895 年領有台灣之後，時任大藏大臣的松方正義立即發表意見，主張將台灣銀行的設立視為日本帝國甲午戰後經營的一環，並強調「開拓台灣須符利用厚生主義，首應設置金融機關，而此金融機關須為擁有紙幣發行權的特殊銀行，以便他日非常時期之際，有助於新得領土之財政」（台灣銀行，1919：14）。然而，甲午戰後日本國內勢力急速膨脹的實業家們，心中掛念的是如何進出中國市場，對台灣銀行的設立，抱持相當消極的態度。舉例來說，三井物產的益田孝，雖然一度同意擔任台灣銀行的創立委員，卻因反對政府的「特殊銀行案」，只當了 2 個月就辭去創立委員一職。安田銀行的安田善次郎雖然身為創立委員的一員，卻與政府意見相左，主張將來設立的台灣銀行應為一商業銀行，而非殖民地銀行。台灣銀行的設立，因為實業家與政府之間齟齬橫生，在草創時期困難重重。為了讓台灣成為明治政府經濟安全保障的一環，山縣有朋內閣重新任命包含台灣總督府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在內的 11 位創立委員，加重政府官僚在創設委員中的比重，積極推動台灣銀行的設立（參見表 2）。

以山縣有朋為核心所組成山縣派系，在日本明治時代末期，結合宮中、陸軍、樞密院、貴族院、眾議院以及文官官僚，是當時日本政界影響力最大的政治集團。1897 年前後，從山縣有朋開始，桂太郎（第二任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第四任台灣總督）等長州藩山縣系的重要成員，透過其對台灣政策的影響力，大力鼓吹台灣在南進政策中的特殊地位（季武嘉也，1998：27-28）。台灣銀行的設立，正是這種構想的具體實現。1897 年制定的《台灣銀行法》中，明述台灣銀行的創設宗旨如下：「台灣銀行作為台灣的金融機構，旨在為工商業及公共事業通融資金，開發台灣的富源，謀求經濟的發展，進而將營業範圍擴大到華南地區及南洋諸島，成為這些國家的商業貿易機關，發揮協調金融的作用」（台灣銀行，1919：14-15）。這正說明，台灣銀行當初創設的目的，一方面希望遂行其政治目的一彰顯及強化統治權力，另一方面則是達成其經濟目的一協助日系資本在台灣、中國華南以及南洋的發展（李世暉，2008：92）。

表 2：台灣銀行創立委員一覽表

姓名	職 稱	備 考
野村政則	台灣事務局長	1897 年 11 月 8 日就任 (1898 年 1 月 26 日辭任)
添田壽一	大藏省監督局長	" (第一任台灣銀行總經理)
川口武定	海軍主計總監	" (1898 年 3 月 15 日辭任)
澀澤榮一	第一銀行總經理	"
原六郎	帝國商業銀行會長	"
高橋是清	橫濱正金銀行副總經理	"
大倉喜八郎	大倉組總經理	"
安田善次郎	安田銀行監事	"
鶴原定吉	日本銀行營業局長	" (1899 年 5 月 10 日辭任)
池田謙三	東京貯藏銀行總經理	"
濱田光哲	關西貿易社長	"
西村真太郎	大阪四ツ橋銀行總經理	"
大谷嘉兵衛	茶業組合中央會議議長	"
木原忠兵衛	日本中立銀行總經理	"
吉井友兄	東京稅務管理局長	1898 年 5 月 7 日就任 (1899 年 4 月 20 日辭任)
後藤新平	台灣總督府民政長官	1899 年 1 月 16 日就任
松尾臣善	大藏省理財局長	"
森田茂吉	內務書記官	"
樺原陳政	公使館二等書記官	"
水野遵	台灣總督府財務局長	"
益田孝	三井物產專務理事	" (1899 年 3 月 9 日辭任)
松尾寬三	日本勸業銀行監察役	1899 年 3 月 9 日就任
佐藤里治	商業銀行執行董事	"
柳生一義	遞信省郵便局長	1899 年 4 月 19 日就任 (第一任台灣銀行副總經理)
下阪藤太郎	大藏省參事官	"
土岐債	第一銀行釜山分店經理	1899 年 5 月 10 日就任

資料來源：參酌波形昭一 (1985 : 68) 整理。

『台灣銀行法』公佈 2 年後 的 1899 年 7 月，台灣銀行正式在台北成立。1900 年 5 月，台灣銀行決定於廈門設置分店；這項決策，是以「南進政策」確立明治政府經濟安全保障的第一項具體提案。當時台灣民政長官後藤新

平認為，台灣銀行廈門分店的設置，「並非只為台灣經營所設之金融機關，而是為帝國將來經略南洋鋪路。為推進帝國南進，除了廈門分店的設置以外，別無良策。……（這是因為）今後國際上的競爭，已非用腕力征服土地人民，而是用金錢收服土地人民」（鶴見祐輔，1965：426）。此外，台灣銀行自 1905 年之後，也開始在廈門、福州等地發行銀本位的通用貨幣（即「圓銀通用政策」），強化其在當地的經濟影響力（島崎久彌，1989：24-25）。

具有前述「經濟安全保障」政策思維的台灣銀行，利用台灣的特殊地位，成功地把勢力伸進華南地區的幾個重要都市，並於這些都市陸續開設分店與辦事處，發行銀本位的通用貨幣。例如 1900 年於廈門，1903 年於香港，1905 年於福州，1907 年於汕頭，1910 年於廣東，1911 年於上海，以及 1912 年於九江（小島仁，1981：203）。另一方面，台灣銀行也嘗試藉由與歐美金融資本的連結，超越「台灣金融機關」的領域，仿效橫濱正金銀行，成為一個「對中國金融機關」。1908 年，台灣銀行頭取（總經理）柳生一義在視察倫敦之際，成功地在英國 Perth 銀行完成 20 萬英鎊的信用設定。這對資本額只有 500 萬日圓，在海外市場毫無知名度的台灣銀行而言，可說是邁向海外市場成功的一步。柳生一義對此成功的經驗相當興奮，回國後極力主張導入外資以增加台灣銀行在世界市場上的信用，並以倫敦為中心，在全球市場上籌措開發中國華南與南洋地區的資金（清水孫兼，1922：63-65）。

然而，台灣銀行欲藉增資計劃導入外資的構想，在經濟安全保障的思維下，遭受日本政府的反對而被迫中止。這是因為，日本政府考量到，金融體系相對脆弱的台灣，不宜貿然直接引進大量外資，以免受到國際金融勢力的直接影響。即便如此，台灣銀行仍透過在中國各地設置的分店，持續推動該行「對中國金融機關」的構想。除此之外，台灣銀行也配合明治政府對外經濟發展戰略，開始積極介入中國的金融市場，企圖透過對中國的貸款，來掌控中國的經濟與金融。

肆、日本透過台灣南進

明治維新之後，日本國內的領導菁英都有下列的同志向：為了不使東亞地區被歐美列強所併吞，東亞地區也必須創出強國；為了這個目標，日本必須與擁有豐富資源的中國合作；對尚未領悟到危機的中國，日本必須肩負起「指導」中國的責任（季武嘉也，1998：14）。然而，隨著日俄戰爭的勝利，日本的經濟安全保障思維，開始朝向帝國主義躍進。辛亥革命之後，東亞及世界局勢出現激烈變動。面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中國的南北分裂、俄國革命等各種問題，日本的政策選項也出現多樣化發展。圍繞著以中國東北為主的「大陸政策」，日本國內各政治集團的爭論與鬥爭日益頻發。其中，關於「滿州經營」的中國議題，長久以來都受陸、海軍權力構造，以及薩長藩閥鬥爭所制約。

甲午戰爭以後，長州派陸軍透過「總督／都督武官專任制」，長期獨占台灣、朝鮮與滿州的支配權。1913 年成立的「第一次山本權兵衛內閣」，首度對陸軍的殖民地支配權力提出挑戰。山本權兵衛為薩摩派海軍的重要領袖，企圖透過廢止總督／都督武官專任制以及擴大內務省監督權限，從法制上顛覆陸軍殖民地支配的基礎。同時，為對抗陸軍的北進論，海軍再度高唱南進論。日本海軍掌控台灣之後，在「南進論」的政策思維下，透過台灣總督府調查科對南洋地區進行大量、大規模的調查。根據《台灣經濟年報 昭和十八年版（1943 年）》所收錄的「台灣總督府外事部與南方資料館發行南方關係印刷物目錄」，1920 年以後，台灣對南洋的調查出現大幅成長（參見表 3）。與此同時，台灣銀行也推動華南銀行的設立，期盼結合台灣以及南洋華僑的力量，協助日本在南洋的發展（許雪姬，1996：103）。

就台灣殖民地歷史而言，1936 年是極為特別的一年。1936 年 8 月，在日本國內與台灣總督府高唱「南進論」的背景下，南進政策經由日本內閣會議決議，首度成為日本「國策的基準」。為整合台灣島內戰爭準備工作，日本乃於 1936 年 11 月成立國策機構「台灣拓殖會社」。台灣拓殖會社與南洋拓殖會社齊名，為日本兩大南方國策機構之一；其主要任務，是推行

表 3：台灣總督府調查科的南方調查書一覽表

	南方一般	南支那	仏印	泰国	緬甸他	馬來	菲律賓	蘭印	濠洲他	合計
第一期	9	14	2	1	2	2	4	6	0	40
	22.5	35	5	2.5	5	5	10	15	0	
	5.9	11.8	5.4	5.9	10.5	7.4	7.4	6.5	0	
第二期	45	39	5	3	5	9	25	48	3	182
	24.7	21.4	2.7	1.6	2.7	4.9	13.7	26.4	1.6	
	29.4	33.8	13.5	17.6	26.3	9	46.3	52.2	60	
第三期	89	40	23	11	10	15	20	24	2	234
	38	17.1	9.8	4.7	4.3	6.4	8.5	10.3	0.8	
	58.2	33.6	62.2	64.7	52.6	55.6	37	26.1	40	
第四期	10	26	7	2	2	1	5	14	0	67
	14.9	38.8	10.4	3	3	1.5	7.5	20.9	0	
	6.5	21.8	18.9	11.8	10.5	3.7	9.3	15.2	0	
合計	153	119	37	17	19	27	54	92	5	523

註 1：第一期為 1910-1919 年，第二期為 1920-1935 年，第三期為 1936-1940 年，第四期到 1942 年為止。

註 2：各欄的下段數字的上方數字代表地域別分布的百分比，下方數字表示各地域的時期別分布的百分比。

註 3：「南方一般」表示綜合性的南方調查，「南支那」是華南地區，「仏印」是指法屬印度支那，「緬甸他」包含印度，「蘭印」是指印尼，「濠洲他」是指澳洲及南太平洋諸島。

資料來源：參酌台灣經濟年報刊行會（1943：73）整理。

台灣島內拓殖事業，並在台灣總督府、拓務省、外務省的監督下，在華南、南洋地區進行金融活動。

1937 年 7 月 7 日爆發「盧溝橋事變」後，日本與中國全面開戰。隨著中日戰事的擴大，海軍與台灣總督府對南方的關心再度升高。1938 年 9 月，台灣總督府為確立對廣東、汕頭、海南島的支配權，在海軍指示下制訂「南方外地統治組織擴充強化方策」，主張活用台灣經驗，以協助日本在南方進行有效統治。1939 年，日本佔領海南島之後，海軍決定由台灣總督府來協助海南島的開發。當時的日本決心永久佔領海南島，在島上大力推行土地改革、皇民化政策、專賣事業以及保甲制度。日本之所以將海南島的開發交給台灣總督府負責，其中一個重要的理由就是，台灣的統治經驗與統

治技術有助於日本對海南島的統治。這也意味著，隨著中日戰事的擴大，台灣的地位日形重要。

1939 年 9 月，德國入侵波蘭的軍事行動引爆了歐陸的全面戰事。在歐洲列強無暇東顧之際，日本乃決意驅逐歐美勢力，獨占東亞地區的利權。為了有效統治東亞地區的殖民地與佔領區，日本乃於 1942 年公布「大東亞金融財政及交易基本政策」，規劃設立以日圓作為共同清算貨幣的「大東亞金融圈」。依據「基本政策」所形成「大東亞金融圈」有下列三項特色（島崎久彌，1989：344-45）：

- 第一，圈內各區域設立擁有貨幣發行權的中央銀行；
- 第二，日圓為圈內地區所有通貨的價值基準，以及發行的基礎；
- 第三，圈內各地之間的決算，以特別日圓執行；圈內對圈外的決算，也以特別日圓決算為方針。

「大東亞金融圈」的運作基礎，是日本對台金融政策的成功經驗；而其最終目標，是要在大東亞共榮圈內構築新的金融秩序，以日圓本位制為大東亞共榮圈的普遍貨幣制度，取代黃金或英鎊的支配力。

日本在南洋佔領區進行的貨幣、金融工作，最初是以發行表示現地通貨的軍票為主。譬如說，在菲律賓發行 *Peso* 軍票，與當地的 *Peso* 進行等價交換。日本軍票的使用目的，一方面是為了支付日本派遣軍的軍費，另一方面則是驅逐佔領地的法定貨幣。但是，由於軍票脫離不了日本國內貨幣的領域，且不可任意兌換成其他外幣以滿足現地的貿易需求，以致無法達成吸收、取代現地通貨的目標。有鑑於此，日本乃於 1942 年成立南方開發金庫，發行「南方開發金庫券」（南發券）以取代軍票。

由日本政府出資 1 億日圓成立的南方開發金庫，一方面發行「南發券」吸收現地通貨，另一方面則擔負起現地資源的開發利用、物資集散的功能。日本的目的，是想在南洋佔領區成立中央銀行之前，以南發券當作地區暫時的共通貨幣。因此，流通總額達 115 億日圓的南發券，票面上標記的發行者不是南方開發金庫，而是大日本帝國（日本銀行調查局，1974：318）。之後，因太平洋戰事的膠著與不利，日本為籌措軍費，大量發行、使用南

發券，結果導致日本佔領地區的嚴重物價膨脹，加速弱化日本帝國的統治基礎。

總的來說，以台灣為起點建構的大東亞金融圈，原本是位了確保日本帝國的經濟安全保障。但隨著時間的發展與軍事占領範圍的擴大，此一政策逐漸從原本維繫日本經貿穩定的思維，轉變為掠奪占領地資源的措施。在此一思維轉換的背景下，台灣也從日本帝國經濟南進的墊腳石，變成軍事國防南進的先驅。

伍、結語

地緣經濟概念下的日本屬於海洋國家。對海洋國家日本而言，其安全保障必須面對下述地緣的缺陷：第一，國家空間狹小，戰略縱深極其有限；第二，國內資源貧乏，市場狹小，對外依賴嚴重；第三，資源產地、市場與日本之間的聯繫依靠漫長的海上運輸線；第四，人口、經濟、交通高度集中，能力脆弱。上述地緣特徵造成了日本安全環境的脆弱性，直接影響日本的安全保障戰略（陸俊元，1995: 18）。若以國際環境變化來看，海洋國家日本自明治維新之後，就開始與中國、俄羅斯等陸權國家，以及西方海權國家展開地緣政治經濟的利益競爭。

台灣的地理特質與日本接近，同屬海洋島嶼國家，且同樣地依賴海外的經貿網絡。殖民統治時期的台灣，在經濟上是日本的農業資源提供地，在軍事國防上則是日本的南進基地。若將日本視為引發或參與近代東亞地區戰爭的重要角色，台灣則是此一歷史發展過程中的關鍵，特別是地緣經濟上的關鍵。值得注意的是，對日本而言，無論是二次世界大戰之前，還是戰後的冷戰、後冷戰時期，台灣在東亞地緣經濟的變遷過程中，一直扮演重要且關鍵的角色。而台灣也在 1990 年之後，開始正視己身地緣經濟角色的關鍵性，並提出「亞太金融中心」、「亞太營運中心」等政策構想。因此，雖然在東亞區域安全相關議題上，台灣受限於國際現實而無法享有相應的發言權；但在地緣經濟概念日益重要的未來，台灣依舊將是影響東亞與亞太經濟安全的重要行為者。

參考文獻

- 大江志乃夫，1993。〈山県系と植民地武断統治〉收於大江志乃夫、浅田喬二、三谷太一郎（編）《岩波講座・近代日本と植民地 4—統合と支配の論理》頁 3-29。東京：岩波書店。
- 小島仁，1981。《日本の金本位制時代（1897-1917）》。東京：日本經濟評論社。
- 小野一一郎，2000。《近代日本幣制と東アジア銀貨圏一円とメキシコドル》。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
- 小熊英二，1998。《日本人の境界：沖縄・アイヌ・台湾・朝鮮—植民地支配から復帰運動まで》。東京：新曜社。
- 日本銀行調査局編，1974。《図録—日本の貨幣 10：外地通貨の発行》。東京：東洋經濟新報社。
- 加藤陽子，2002。《戦争の日本近現代史》。東京：講談社。
- 台湾經濟年報刊行会，1943。《台湾經濟年報 昭和十八年版》。東京：國際日本協會。
- 台灣銀行（編），1919。《台灣銀行二十年誌》。台北：台灣銀行。
- 吉野誠，2000。〈明治 6 年の征韓論争〉《東海大学紀要—文学部》73 輯，頁 1-18。
- 江沢讓爾，1939。〈經濟地理学に於ける空間概念〉《一橋論叢》3 卷 2 期，頁 211-29。
- 何耀光，2013。〈1930 年代日本帝國的戰略選項—以東北亞地緣戰略條件為核心的觀察〉《成大歷史學報》44 號，頁 187-236。
- 吳雪鳳、曾怡仁，2014。〈北韓的地緣政治經濟戰略：金正日主政以來的轉變〉《遠景基金會季刊》15 卷 3 期，頁 57-116。
- 李世暉，2006。《貨幣制度と国家権力：近代台湾貨幣制度変遷からの一考察》博士論文。京都：京都大学經濟学研究科。
- 李世暉，2008。〈日本政府與殖民統治初期台灣的幣制改革〉《政治科學論叢》16 期，頁 71-112。
- 李世暉，2016。《日本國家安全的經濟視角：經濟安全保障的觀點》。台北：五南文化。
- 季武嘉也，1998。《大正期の政治構造》。東京：吉川弘文館。
- 波形昭一，1985。《日本植民地金融政策史の研究》。東京：早稻田大学出版部。
- 島崎久彌，1989。《円の侵略史—一円為替本位制度の形成過程》。東京：日本經濟評論社。
- 清水孫兼，1922。《柳生一義》。東京：山崎源二郎發行。

- 陸俊元，1995。〈從地緣政治看日本的安全戰略〉《日本學刊》3 期，頁 16-24。
- 陸奧宗光，1929 [1983]。《蹇蹇錄》。東京：岩波書店。
- 鹿島平和研究所編，1973。《日本外交史 22 南進問題》。東京：鹿島研究所出版會。
- 朝日新聞社（編），1944。《南方の據點・台湾：写真報道》。東京：朝日新聞社。
- 渡辺利夫，2007。〈極東アジア地政学と陸奥宗光—『蹇蹇錄』を読む〉《環太平洋ビジネス情報 RIM》Vol. 7，No. 26，頁 4-12。
- 楊宗惠，1999。〈地緣政治研究今昔〉《師大地理研究報告》30 期，頁 159-74。
- 藤沢親雄，1925。〈ルドルフ・チェーレンの国家に関する学説〉《國際法外交雜誌》24 卷 2 号，頁 49-69。
- 鶴見祐輔，1965。《後藤新平 第二卷》。東京：勁草書房。
- Cohen, Benjamin J. 1978. *Organizing the World's Money*. New York: Basic Books.
- Cohen, Saul B. 1973. *Geography and Politics in a World Divid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ushofer (服田彰三譯)，1940。《太平洋地政学・地理歴史相互關係の研究》。東京：日本青年外交協會。
- Jansen, Marius B. 1984. "Japanese Imperialism: Late *Meiji* Perspectives," in Ramon H. Myers, ed. *The Japanese Colonial Empire: 1895-1945*, pp. 61-79.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Luttwak, Edward N. 1990. "From Geopolitics to GeoEconomics: Logic of Conflict, Grammar of Commerce." *National Interest*, No. 20, pp. 17-23.
- Luttwak, Edward N. 1993. *The Endangered American Dream: How to Stop the United States from Becoming a Third World Country and How to Win the GeoEconomics Struggle for Industrial Supremac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 Mahan, Alfred Thayer. 1918 [1890]. *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 Mackinder, Halford. 1919. *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 A Study in the Politics of Reconstruction*. London: Constable & Co.

Relationship between Japan and Taiwan of Modern War: Perspectives on Geo-economics

Shih-Hui Li

*Professor, Master's Program in Japan Stud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Abstract

There is no doubt that Japan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riggering or even participating in the war in modern East Asia area, and Taiwan is the key to thi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In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Taiwan is the economic heartland to provide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also being positioned as a military and defense base for the Japanese southward advance policy. Particularly, either the time previous to World War Two, or the period from the Cold War through the post- Cold War, Taiwan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and pivotal role in the evolution of the East Asian geo-economics.

Keywords: modern war, geo-economics, Japan, Taiwan, economics security